

THE HERO IN HISTORY

SIDNEY HOOK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IDNEY HOOK
THE HERO
IN HISTORY

A Study in Limitation and Possibility

The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 1943

本书根据紐約約翰 戴伊公司 1943 年英文版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 西方学术译丛 ·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58,000

1964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3,501—35,500

书号 2074·287 定价 1.35 元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作为事件和问题的英雄	4
1. 现代世界中的领导	
2. 英雄的养成	
3. 英雄作为危机的产儿	
4. 英雄和历史哲学家	
5. 对英雄感兴趣的心理根源	
第二章 思想界的英雄	19
1. 文学、音乐和绘画	
2. 哲学和科学	
3. 宗教	
4. 历史的英雄	
第三章 帝王的影响	29
1. 统治者的性格和历史条件	
2. 某些引人注意的相互关系	
3. 靠配子的权利的三宝	
4. 对伍德的发现的解释	
第四章 社会决定论：黑格尔和斯宾塞	40
1.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	
2. 决定论的共同假定	
3. 斯宾塞的公式	
第五章 社会决定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	52
1. 经验的因素	
2. 恩格斯和辩证法的神秘主义	

3. 普列汉诺夫和彭帕杜尔夫人	
4. 一元論和証据之間的冲突	
第六章 英雄活动的框架	72
1. 社会决定論的遺產	
2. 英雄行为和历史的选择道路	
3. 英雄作为傀儡	
第七章 历史中的“如果”	85
1. 特魯埃的馬車和法兰西的隕落	
2. 对英国的入侵	
3. 波斯在馬拉敦的胜利	
4. 丘吉尔論李在葛的斯堡的胜利	
5. 幻想的“如果”和科学的“如果”	
6. 預言的偶然性	
第八章 偶然和意外	98
1. 历史配景法的种种差异	
2. 偶然性的意义	
3. 偶然性的限制	
4. 历史上丧失了的机会	
第九章 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創造性人物	108
1. 为英雄下定义	
2. 事变性和事变創造性的人物	
3. 君士坦丁和杰斐逊	
4. 太平无事的年代	
5. 罗伯斯庇尔和查士丁尼	
6. 英雄、机关和社会阶级	
7. 事变性的幻想	
8. 几位事变性的妇女: 克里奥佩特刺, 提奥都拉, 叶卡特琳娜二世	
第十章 俄国革命: 一件用来檢驗的事例	131
1. 十月革命的影响	
2. 十月革命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嗎	

3. 列宁作为一个事变性人物或历史的英雄

4. 一个沒有列宁的世界

5. 列宁的政治画像

第十一章 英雄和民主..... 159

1. 一个民主社会能够信托英雄嗎

2. 英雄作为一个煽动者

3. 英雄和受付托的权力

4. 关于英雄的民主主义哲学

5. 对民主的批評家: 慕斯加、帕雷塔和米雪尔斯

第十二章 规律、自由和人类行为 172

1. 历史规律的范围

2. 社会必然性的程度

3. 責任和自由

4. 我們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

导 言

本书的书名說明了它的主题，不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把它叫做《历史中英雄的局限》，或許同样适当。这个书名也能說明本书的内容，不过还不是我們关于历史英雄的想法。我們的想法，书里作了詳細的叙述。請讀者不要单从书名上去推测。

历史是由男男女女造成的，这一点，除了某些神学家和神秘的形而上学家，誰都不再否认了。即使是那些神学家和神秘的形而上学家們，也不得不間接承认这个平凡的真理，因为他們把历史人物說成是天意、正义、理性、辯証法、Zeitgeist^①，或者时代精神的“工具”。在历史上使用“工具”的后果，人們比較容易同意；至于“工具”果真为什么样的最后目的服务，被认为决定“工具”的原因又是什么，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

后果是难以确定的；人們的意图尤其难以确定。不过，只要我們想認識真理，有关我們的意图問題，我們原則上总能明智地解答。但是关于抽象概念的意图，关于那些起因的决定作用，我們就无法取得科学性的一致意见了，因为关于它們的意义、証据和真相，我們无法做同样的臆測。

我們知道，阿提拉（Attila）^②的破坏行为加速了羅馬帝国的灭亡。我們不能象某些受害的教徒們，断定他是“上帝的鞭子”；也不能象某些现代学者，完全相信他是一連串原因的后果，而这原因的鏈条的第一个环节，是在中国气候的变化中鑄成的。

① 德文，即时代精神。——譯者

② 侵入羅馬帝国的匈奴首領。——譯者

我們知道，希特勒发出了信号，把全世界六大洲都投入了战争。我們怀疑，象一位自命发现上帝秘密的人最近所说的，希特勒和其他暴君們都是“天意的工具，是在惩罚离开正道的民族，”或者，象其他一些人所说，希特勒只不过是当代基本矛盾的结果，即社会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这个譬喻有意思，那就让人们充当工具吧。不过也要记住，工具可以用来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有时是全然不同的目的。人也是一种工具，他对于这些目的应该是什么，会有些话要说。他所服务的那个目的，是可以从他自己规定下的、他自己理解的那些目的里面推测出来的。人们只有在抱着某些目的的时候，才能创造历史。

不管人们创造什么，一支枪或一本书，一次战争或革命，另外一个社会或另外一个人，他们的创造总是要受一定条件支配的。就连人们所设想的那些神，大都也是在当时存在的物质条件限制之下，进行创造的。任何别的创造，对于轻信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奥秘，而对于有批判精神的人来说，就是支离破碎的神话了。

凡是承认人们确实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历史哲学，也都得把它本身跟当时的各种条件联系起来。它要广泛地估计到，某一时期，人们进行活动的各种条件的比重，他们的思想、计划和目的的比重。这些思想、计划、目的扎根在复杂的各种条件之中，但是它们从已经提了出来的改造条件，使其更符合人类愿望的计划中，取得意义。科学的历史家的专门研究中有同样的问题。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如何发生的和为何发生的，要予以圆满解释，就得在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提供材料、有时又提供规律，但绝不提供人类历史戏剧细节的起决定条件作用的背景之间，结算出一笔似乎可信的双方比较的清账，不然就有困难。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们从大处着手，历史学家们则从小处着手。前者通常为行动的纲领或得救的希望，提出全盘的解决办法。后者避开了大规模的概括，小心地逐项研究。对于历史上“伟人”或“英雄”的作用，这种方法显然也是适用的。

以后各章的分析，其目的主要是给这个迷惑人的问题构成一个

有成果的系統提法。我們要努力概括出各种类型的情境和条件，以便正确地承认或否认杰出人物对那些情境和条件的随时的影响。我們提供的不是一种历史理論，而是对历史理論的一点貢獻。要給人类历史作出适当的解释，这一点貢獻是應該受到注意的。

第一章 作为事件和问题的英雄

尽管我們的年龄已过了崇拜英雄的青年期，我們对于英雄还是始終感兴趣。这种兴趣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但是它們的强度和性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各有不同。在我們这个时代里，人們对杰出人物的言行感到的兴趣高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所以热烈关切当代无冕英雄的思想和事业，它的特殊原因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期中，各国人民的命运好象显然系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决定。不錯，这些特殊原因反映了战争中間戏剧性的紧急問題，但是在不太动乱的年代里，也还有其他一些根源起着作用。这两方面我們都要加以討論。

1. 給这种英雄兴趣提供材料的基本事实，就是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在每一个重要的社会組織形式中，都不能沒有領導。控制領導的方法，公开的或隱蔽的，各个社会，各不相同，但是領導人时刻都在眼前，不仅是国家的明显象征，并且是責任、决策和行动的中心。这样，就有一种自然傾向，要把領導人跟在他領導之下所取得的成果，联系起来，尽管那些或好或坏的成果，毋宁是不顾他的領導而产生，而并不是由于他的領導而产生的。既然許多因素都在起着作用，那种“在此之后，所以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謬誤論断，对于头脑單純、不善于鉴别的群众以及沒有耐心的行动中的人，就注定是有道理的。人們会要胡佛对于某次的經濟蕭条負責，其实那次經濟蕭条的种子，在他上台以前，早就种下了。如果在鮑尔温(Baldwin)执政期間，社会上沒有发生过大灾难，人們就会认为他穩健可靠，尽管他已經給欧洲火药庫点上了一根慢慢燃燒着的导火綫。

当前，領導对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普遍影响是用不着再推脫的。

这种影响，不論好坏，是公开宣布了的，集中組織起来的，并且不断增长着。世界上主要国家中，中央集权政府之下的各种組合經濟发展到了这么一种地步，我們可以毫不夸张地說，少数几个人，竟能对那么多的不同領域，同时发生影响，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外交、陆海軍事、教育、住宅、公共工程、救济事业方面，还有一——除英、美外——宗教、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科学方面的主要决定，都是由少数几个国家領袖作出的，而且常常是由一个人作出的，他的判断和嗜好，就成为国家的絕對法律。交通工具的大发展能够把种种决定象光一样快地传到各个角落去，保証一种空前的有效控制。

一个愷撒、一个克伦威尔、一个拿破仑确实能够向許多部門发号施令。但是那些部門，在行政和职能上，不象今天結合得那么严密。他們无法强迫人們普遍遵守他們的法令，甚至也无法压制批評。有些漏洞永远堵塞不了。有些精神避难所也不是他們的执法吏所能接近的。过去专制統治者在位期間，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和哲学上，都有各种矛盾的傾向，这就証明了他們无法把文化限制在他們的教条和法令里面。他們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少尝试。

今天，世界的面貌大不相同了！一个希特勒、一个斯大林、一个墨索里尼确实能够向各个方面，从軍事組織直到抽象的艺术与音乐，发号施令；这些独裁者百分之百地貫徹他們的法令。他們的决定不仅影响到謀生的可能性——这在集权国家，并不是稀罕事——并且影响所有的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影响到他們国家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内容与方向。当然，在他們控制的部門中，不可能靠一道命令，搞出一批天才来，但是他們完全可以毁灭一切和他們不相一致的才能。通过各級学校（因为知識是一种武器），通过无线电（如果声音够响的話，誰也逃避不了），通过书报和电影（人們自然而然地想从里面得到消息和消遣），他們把他們的教育灌輸到人民的“下意识”里去。

沉默寡言和隱姓埋名也不再保險了。精神上的一切避难所都被

消灭。蒙田(Montaigne)^①对那些想逃避当时政治风暴的人们提出过的明哲保身和不关心世事的劝告，也就是一百年前引起圣貝夫(Saint-Beuve)^②共鳴的那种劝告，今天肯定地会引起秘密警察的疑心。这种情况不仅标明欧洲从昨天的专制主义走过来，走了多远；同时也是一种标志，那就是說，除了領袖和他的左右，每个人既沒有得到一种公共的生活，却連私生活也丧失了。

象在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其所以民主，那是因为領導大体上仍向代議团体負責而且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批評——行政当局的权限也大大地扩充了。这，一部份是由于它們的經濟有走向国家資本主义的趨勢；一部份由于在反对集权国家的侵略、爭取生存的斗争中，必須进行总体防禦。不管原因是什么，事实确是如此，而且越来越清楚了。最近几年，美国总统和英国閣員們的自由行动的权力，超过了他們前輩所能梦想的范围，除了外交政策方面可能还有例外。

既然那么少的几个人，显然能决定那么多的事情，那末对于杰出人物的历史意义感到强烈的兴趣，就不足为怪了。所以不需要高明的理論就可以知道，不管现有的領導如何，每个人跟它都有最具体的实际利害关系。最高政治指揮部里的个人意见和品质也許会給大家招致灾难，也許会給大家造福。老百姓先生^③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所作的道德評價——只要他能把他的評價保持在街談巷議的水平之上——至少，有一次，是跟历史有联系，而且是合理的。

形势的基本邏輯（这一点对于我們目前感到兴趣的問題很有启发，我們以后还要常常提到）是这样：要么历史行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实是无可逃避的，要么不是。如果是无可逃避的，现有的任何領導，在决定今天和明天的主要历史型式上，就完全成为一个次要

① 法国著名散文家。——譯者

② 法国文艺批評家。——譯者

③ 老百姓先生是十五世紀道德劇的主角。——譯者

因素。如果不是，那就要問：某一个領導的性格，對於我們歷史地位和前途，在因果關係上究竟應該負責到什么程度，而且既然牽涉到人，又在道義上，應該負責到什么程度？象我們將看到的，那些大談特定的歷史前途不可避免性的人們，要么用行動和另外一些言論表明他們的話是假的，要么就把兩種信念混淆起來，一種是對无可逃遁的前途的信念，另一種是對特定領導（通常也就是他們自己的領導）的不可避免性的信念，這個領導會引導我們走向這種前途。有時候他們兩件事都干。我們還會看到，否認歷史行動的主要路線的不可避免性，並不一定就等於說，歷史的前途總是取決於領導的個性。歷史上有比“定命律”和“偉人”更多的花樣。就領導的歷史作用來說，這是程度和各種類型的形勢問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約略指明，到什么程度、在哪一類的形勢里，才應該說領導確實改變了當時的歷史方向，又在哪一種形勢里，才應該說它沒有改變。

2. 對英雄感到興趣的另一根源，要從教育青年的過程中所養成的態度里去尋找。每一個國家的歷史，都是用偉大人物——神話上的人物或現實生活里的人物——的勳績，向青年表現出來的。在某些古代文化里，人們推崇英雄為民族之父，象以色列人對亞伯拉罕那樣，或者推崇英雄為國家的締造者，象羅馬人對羅馬勒斯那樣。在現代文化中，初年級歷史教育的英雄內容並沒有因為教學方法的改變而受到什麼影響。這或許由於故事形式的戲劇效果，這種形式是在人們把歷史作為連續不斷的个人遭遇來處理時，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或許也反映了倫理學者理解兒童心理的一種最簡單的入門方法。再加上民間故事和傳說的影响，這種五花八門的早年教育，在青年人的易于塑造的思想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從個別的人物上升到社會制度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從圖畫似的、具體的東西走向抽象。沒有經過適當的訓練，這個轉變是不容易得到的。許多人總想把“社會力量”、“經濟法則”和“文化風格”人格化，其原因無疑就在這裡。這些抽象概念，幾乎象古代英雄那樣，強迫着、命令着、統治着，並且面對着和克服着困難。在許多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里，在這種譬

喻后面，你几乎能够看见資本和利潤已經給“生产力”套上了鐐铐，“生产力”正在拚命掙扎，而沒有加入这一場拉鋸戰的人們屏住气，看它們打出个分晓來。

就是在更高的教學水平上，“英雄”史觀的方法也沒有放棄。結集在杰姆士·哈尔威·罗宾生(James Harvey Robinson)和《新史学》杂志周围的美国历史学派，曾給过去的美国作过动人的现实主义的解釋。不过如果他們以为，他們已經撇开了英雄和伟人，走上了經濟和社会“力量”的明确道路，他們就是在欺騙自己了。他們从神龕里挪去了国王、政治家和將軍，又在原位上放上了工业和金融界的巨頭、哲学和科学界的大思想家。这种更換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它的含意跟他們有計劃地貶低个別人物意义的历史方法論却不一致。聰明的学生常常从他們的著作中，得到这种印象，例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高尔德(Gould)和摩根(Morgan)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伟人；如果把他們的才能利用到政治方面來，事情就会多么不同啊！”^①

今天，对待英雄和領袖的这种态度，不单是历史教育的偶然的副产品。在大多数国家里，特别是在集权国家里，他們千方百計地向儿童、学生和成年人宣扬英雄崇拜和領袖崇拜。进步的交通技术，灌輸信仰的新的心理学方法更能鼓起群众热情和領袖崇拜，这种热情和崇拜在拜占庭也不多见。现代独裁者們可以在一个羅馬皇帝替他自己建立的一座雕象的地方，貼出一百万张石印像來。每一种工具都被用来增加他們的威信。他們把历史改写过，叫人毫不怀疑，历史要么就是英雄們、亦即領導者的前輩們的業績，要么就是惡棍們、亦即領導者的敵人的事迹。从領導者当权的那一天起，他就公开鼓吹他的活动，把它說成是每一桩成就的直接原因。如果收成好，他的功劳比气候的功劳还要大。同样，在他上台以前的历史局面就被說成是坏人阴谋破坏的結果，而不是社会原因和經濟原因的結果。

① 引自一个学生的論文。

今天，跟过去更不同，对“英雄”的信仰是一种人造的产物。誰控制扩音器和印刷机，誰就能在一天晚上造成或打消信仰。如果象某些輕率的作者所說，伟大这个字可以用群众的拥护來說明，那么，伟大是可以加在现代独裁者的身上的。即使沒有加在他的身上，他也很容易搞到手。然而，要认为某一个人能影响历史——就是說，对改变历史事件的方向起了协助作用——一定要得到人們的信仰或拥护，作为他的历史力量的一个条件，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彼得大帝和腓特烈二世都不曾得到过群众的拥护。只有在现代，人民有了知識，甚至在民主政治形式受到嘲弄的国家里，也在到处宣扬忠于民主精神的口头禅，这时，領袖才一定要人們信仰他，以便加强他的权力。还要注意，现代的領袖或独裁者是从一个群众运动的时代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一定要有一个支持他和信仰他的群众基础，好来对抗其他的群众运动。在他当政以前，群众信仰他，是出于生活的沒有出路，是由于漫无限制的諾言的誘惑。一旦独裁者掌握政权，他需要一些群众的支持来巩固他的权力。过此以后，他就可以随意制造公意，使大家相信他的使命是天授的或历史决定的了。

群众的拥护在过去并不是造成領袖發揮效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目前也不是构成历史發揮效力的一个充分条件。一个傀儡元首，象意大利的国王，或者风流君主，象爱德华八世，也許在群众中很有名气，但是他什么事都决定不了。对于我們的目的來說，只有这样一种对历史人物的尊崇才是有关系的，即：这种尊崇使他得以做出一些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出名或沒有得到群众拥护的話，这些事情本来可能就会做不成的。

3. 誰救了我們，誰就是一个英雄；在政治行动的紧急关头，人們总是期望有人来挽救他們。每逢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尖銳危机，必須有所行动，而且必須赶快行动的时候，对英雄的兴趣自然就更强烈了。不管一个人的政治面目如何，总希望解决危机和希望有个强有力的英明領導，来克服困难和避免危險，这两种希望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危机越严重，希望有适当的人，来控制局势的愿望就越强烈，

不管表达这种愿望的形式是默默的祈祷还是公开的鼓吹。至于把这个人叫做什么，“救星”、“馬背上的战士”、“先知”、“社会工程师”、“敬爱的信徒”、还是“有科学头脑的革命家”，那就得看是要用什么教派或党派的词汇了。綱領固然也重要，但是在极端紧张的阶段里，当人們感到一筹莫展或大祸临头的时候，綱領是容易被忘記的。而且，綱領只不过是意图和諾言的公告罢了。作为公告来看，在那些意图实现以前，它們只有具体而微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有力的領導。作为諾言来看，它是可以违反或破坏的，得看是誰許下的諾言，又是由誰来履行的。

形形色色的社会决定論者，尽管在理論上說，个别的人，不論其地位若何，在历史浪潮里无足輕重，他們写起历史来，却不能不承认，至少某些人，在某些重要关头，在改变历史潮流的方向时，起了决定的作用。恩格斯讲到馬克思，托洛茨基讲到列宁，俄国官方讲到斯大林的时候，他們的態度跟他們所承認的意識形态就完全不一致了。就連神学的决定論者，象历代的教皇們，他們认为一切历史事件中都能找到上帝的指示，可是他們讲起宗教改革以来的西方文化来，就好象西方文化也是由躲在上帝背后的路德和加尔文創造出来似的。用来掩飾这些矛盾的紆回曲折的手法，我們以后还要加以考察。事实是尽管决定論者們大談其“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可避免的”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絕不向它妥协。他們自己和別人都看得出来，他們的言論跟行动是抵触的。观其行而不听其言，我們終久会認出他們的真面目。

人事危机的广度和强度各不相同。但是，由各国人民（关于他們，我們有比較完整的紀錄的）的历史来判断，从来沒有哪一個时代，不曾被当时的某些人当作危机时代的。历史本身被描述为一个接着一个的危机，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条件总在起着作用，不管起作用的是些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和条件，而它們也总是永远在起作用的，只要采取行动的途径是打开着可供選擇，甚至被认为打开着的，人們就会感到需要一个英雄出来推动、組織和領導。这种需要往往是感觉到了比清清楚楚地說出來了的时候多；也往往是說